

北京鋼院

BEIJING GANGYUAN

内部发行 請勿外传 第180期 1977年10月27日

毛主席语录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华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并就这项建议作了说明。

新华社记者摄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请大家审议。

中共中央提出这个建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去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非常的事变,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也与世长辞了,我们党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阴谋。粉碎“四人帮”,党心军心民心大快。这场政治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时期。党的十一大制定的我们党在这个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家精神振奋,生气勃勃,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在胜利前进。为了进一步清除“四人帮”在国家政权中的流毒和影响,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成果,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做,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大好,召开这次大会的条件也是成熟的。

在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先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这次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选好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要选好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这是开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保证。

搞好政权建设,搞好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是抓纲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特别是“四人

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混进了一些坏人,还有些成员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而又坚持不改,脱离群众,丧失了代表性。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又长期没有召开,革命委员会没有及时改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没有能够很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各省、市、自治区即将召开的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举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战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精干的革命委员会。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包括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各界的代表人物。要把工人、农民、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为群众公认的优秀分子,把那些在群众中确有威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确有贡献的

先进人物选进革命委员会,而决不要把那些打砸抢者、“闹而优则仕”的人物搞进来。总之,一定要选好革命委员会,使群众一听到新选出的革命委员会的名单,就高兴,就拥护,就受到鼓舞。这样,就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革命委员会也就能够确实发挥它的作用。

在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要经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把各方面的优秀人物和有代表性的人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了先开好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为了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作好五届全国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共中央认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明年春季召开是适宜的。

中共中央意见,在召开五届全国人大的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

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召开,将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抓纲治国,达到天下大治的一件大事。通过这两个会议,我们要把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国人民中恢复和发扬起来,逐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克服“四人帮”造成的困难,迅速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要兴旺,一定要强大,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让我们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续革命,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共同奋斗吧!

关于召开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我国各族人民,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一年多来,坚决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全国面貌一新,形势越来越好。特别是党的十一大的胜利召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团结和坚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提前召开五届人大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提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一致通过,决定于一九七八年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是:政府工作报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这次大会的召开,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大好形势,巩固和发展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成果,推动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地完成抓纲治国的各项战斗任务,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讯)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余秋里副总理受国务院委托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受国务院的委托，十月二十三日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作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的讲话，摘要如下：

一九七五年三月，我曾经向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过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两年多来，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反复的、激烈的斗争，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九七五年，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狠抓了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落实了党的政策，加强了企业管理，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是比较好的。这一年，农业获得丰收，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一。同上年比较，钢、石油、煤炭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铁路日装车由上年的四万多车增加到五万多车。这些成绩，是各级党委带领广大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四人帮”斗争的结果。这就更引起了“四人帮”的仇恨。一九七五年末和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进行了猖狂反扑。

“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一部分权力和他们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疯狂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害，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有些工业产品产量下降。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区和单位坏人当道，资本主义势力猖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使社会主义所有制遭到破坏。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要多久，国民经济就会垮下来，资本主义就会在许多地方复辟。一九七六年，我们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大家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对国民经济面临垮下来的危险感到十分焦虑。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党和国家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也使我国国民经济避免了一次大崩溃。一年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一步一步地有条不紊地前进。在华主席领导下，中央相继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工作会议、铁路工作会议、全国计划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特别是胜利地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党的路线、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所有这些，给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九七七年，我国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新的伟大胜利，国民经济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农业生产从去年冬季以来，尽管遭到了严重的冬冻、春旱、夏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由于广大社员的努力，大大减少了损失。许多地区的粮食生产仍然取得较好的收成，棉花、油料都比上年有所增产。

工业生产，扭转了由于“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造成的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的局面。三月份以后，生产步步上升，六月份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一至九月，工业总产

值累计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铁路平均日装车量，四月份就超过了历史最高月水平，一至九月货运量比去年同期有显著增长。

财政收入，也扭转了连续几年完不成计划的局面，今年一至九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八。

在国民经济和财政状况逐步好转的基础上，华主席、党中央决定，从今年十月一日开始，调整职工工资。这次调整工资的重点，是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职工。调整工资的人数大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另外还有百分之十几的职工，也能适当增加一些工资。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大干今后几个月，夺取国民经济的更高速度。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革命比赛，在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展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所有这些情况表明，经济战线已经发生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一个新的国民经济跃进局面正在出现。这是抓纲治国在经济战线上初见成效的集中表现。

事实证明，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指示和采取的措施，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国人民心意的。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经验告诉我们：哪个地区、部门和单位，对“四人帮”的危害认识得充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深入，哪里政治形势就好，群众积极性就高，经济发展就快。鞍钢，这个我国最大的钢铁基地，过去在“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及其反党帮派的压制下，广大职工抬不起头来，生产长期上不去，事故频繁，设备损坏严重。粉碎“四人帮”以后，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清查运动步步深入，群众被压抑的积极性解放出来了，生产很快上去了。开滦煤矿，过去被“四人帮”诬蔑为搞“唯生产力论”的典型。但是，广大职工一直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在强烈地震摧毁了全部地面建筑、淹没了地下巷道的情况下，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经过一年的顽强战斗，克服了无数困难，生产迅速恢复。这是一个奇迹。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硬骨头精神。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过去几年被“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由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工业生产也大幅度减少。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省大张旗鼓地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形势迅速改观。今年粮食获得大丰收，工业大幅度增产，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这里，我要说一下，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多，国民经济的一些比例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被搞乱了，这些问题不是一年时间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加上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一是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还赶不上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整顿工作刚刚开始，有些企业产品质量差、物资消耗大、劳动生产率低、成本费用高、占用资金多的现象，还没有显著改变；四是人民生活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也相信一定能够解决。

怎么样能够把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搞得更快一些，这是全国上下普遍关心的一个大问题。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

代化强国，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又使我们耽误了一些时间，更增加了任务的艰巨性。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奋勇赶上去。当前的国际形势不允许我们慢，国内形势也不允许我们慢。我们要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做好打仗的准备，非加快速度不可。我们要加强经济实力，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非加快速度不可。

加快速度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干。要通过艰苦的工作，努力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坚决打好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关键十年这一仗，一步一步地去夺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胜利。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把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轨道，全面实现多快好省。

如何加快速度，我们想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整个工作的纲。要抓紧清查，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不把这件事情搞到底，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而且会留下后患。在一些地区、一些单位，这个任务还很重，一定要坚决搞好，不能半途而废。要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经济领域的表现，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分析它的危害，肃清它的流毒。这是思想政治战线的一场严肃斗争，一定要发动群众，认真搞好。要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狠狠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对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要认真进行批评教育，认真纠正。

第二，切切实实地把企业和社队整顿好。学大庆、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要进一步深入开展。现在，有些地方是真学，有些地方是半真半假地学，个别地方还有假学的。准备普遍进行一次大检查，使运动进行得更加扎实，去掉形式主义。当前要着重抓好企业整顿和社队的整顿。这些整顿，要象四清运动那样，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分期分批进行，在明后两年搞完。企业的整顿，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整顿好。企业是不是整顿好了，要检查验收。要看：（1）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得好不好，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了没有；（2）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的领导班子是不是建立起来了；（3）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不是调动起来了；（4）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打击了没有，资产阶级歪风刹住了没有；（5）必要的规章制度是不是建立和严格执行了，企业的机构是不是精简了，过多的非直接生产人员回到生产第一线没有；（6）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特别是质量、消耗、成本等指标和各种设备完好率，有显著进步，还是没有显著进步。搞好了这几条，企业就算整顿好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起码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向大庆式企业前进。争取到一九八〇年，严格按照大庆式企业和大寨县的标准，把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第三，整顿经济工作。中心是搞好计划管理，加强计划性。“四人帮”严重破坏计划经济，使前几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下转第四版）

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

——批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教育部大批判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炮制了一篇毒汁四溅的黑文：《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以下简称《篡改》）。文章先在《红旗》杂志上抛出来，《人民日报》和许多报刊立即转载。这篇文章把原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同志的正确讲话诬蔑为“奇谈怪论”，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四人帮”及其干将、爪牙们一时得意忘形，手舞足蹈。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教育战线的革命师生，却从这“以笔杀人”的刀光剑影中，预感到一场激烈的斗争即将到来。

蓄谋已久的反革命阴谋

这场斗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党的十大以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使用种种阴谋手法，猖狂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大权、架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们阴谋组织自己的“内阁”，妄图打倒周总理。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并粉碎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

毛主席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并且进行了部署。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七月，毛主席又作了关于电影《创业》的光辉批示，提出了“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的英明决策，痛斥了“四人帮”摧残文化教育事业的严重罪行。

这样，“四人帮”及其一伙陷入空前被动的困境。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躲到上海，在阴暗角落里发泄不满：“过十年以后再看！”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提心吊胆地说：“我很苦闷，不知什么时候丢掉脑袋！”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也预感到末日不远，悻悻地说：“我现在上上干校，挤挤公共汽车还可以。”就连最爱“露峥嵘”的叛徒江青，也几个月不敢出头露面。

一九七五年秋，针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发出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的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抓了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工作，就科技和教育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严肃地指出：这些年教育上的问题，“根子不在教师，恐怕也不在学校领导，根子在教育部门领导，在管教育的。”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在教育界的黑干将迟群。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教育战线进行整顿，就是对“四人帮”及迟群之流的大清算。因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他们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就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妄图利用教育阵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面目就要彻底戳穿，他们自封的教育革命的“功臣”、“旗手”之类的桂冠，就会一顶顶落地。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进行全面反扑。

且看他们手忙脚乱的丑恶表演：

在北京，“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面将周荣鑫同志的讲话经过歪曲、篡改后向姚文元密报，一面指使“四人帮”在教育部的一个黑爪牙给毛主席写诬告信，捏造事实，诬陷周荣

鑫同志。与此同时，迟群还指使他安插在教育部的坐探，溜门撬锁，鼠窃狗偷，通宵达旦地偷抄国家机密，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在外地，他们把两校与辽宁、上海的死党、亲信、余党连成一线，昼夜不停地搜集、编印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经过一番阴谋筹划，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姚文元指使他们在《红旗》杂志的一个亲信，授意两校大批判组，炮制了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党大毒草：《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并反复强调，文字“份量要重一些”，“这是一个信号”！《篡改》一经抛出，两校大批判组、“初澜”、“苗雨”等纷纷上阵，呼风唤雨，推涛助澜，大肆鼓噪。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他们陆续从科技、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发动疯狂进攻，密切配合。这一切充分说明，《篡改》在“四人帮”整个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中，占有首先发难的重要地位。

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毒箭

《篡改》首先在大学招生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诬蔑为“奇谈怪论”，横加批判，妄图对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煽动，用心极其险恶。

一九七二年，美籍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时，建议我们采取措施，从小培养基础科学人材，进大学后，一边学习，一边劳动，以培养一批年龄较青的科学工作者。敬爱的周总理赞成这个建议，并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明确指示：现在的教育革命还在试验阶段，可以从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生中选拔好的，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并指出：这个办法，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大学生是平行的。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和迟群明明知道，却拒不执行。

一九七四年，美籍中国科学家再次来华，重提上述建议。五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接见他们时，明确表示，对该建议是赞成的。张春桥一时慌了手脚，竟然大耍无赖，胡说什么“毛主席接见时的谈话，记录记错了”。再次进行抗拒。

特别恶毒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迟群竟把周总理的指示掐头去尾编进所谓“右倾翻案言论”。在炮制《篡改》这篇大毒草的过程中，炮制者生怕过于露骨，提醒迟群：这是周总理的指示。迟群阴险狡诈地说：“引一些代表性的言论，抓住两三句话，展开分析批判，一看就知道是谁说的。”

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了不少学生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的现象，身体也搞坏了。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级各类学校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过去那种“关门读书”、“三脱离”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在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生的同时，也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就成为教育革命深入

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毛主席非常重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但是，从来没有反对过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指出：河南长葛县有的中学实行勤工俭学，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可见，只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这样的高中生上大学，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体系指引下，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才能兴旺发达，国家急需的各种人材才能得到及时培养。就大学说，可以有重点大学，也可以有一般大学，可以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也可以有各种形式的业余大学。就大学生来源说，既可以从上山下乡和回乡的中学生中选拔，也可以从中学生中直接选拔，又可以不受学历的限制，广泛地从各行各业的知识青年中选拔，为国所用，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以来，艺术、外语、体育等专业，都从中学生中选拔过一些人材，直接上大学，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针对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的现实，选拔一批有研究才能的中学生直接升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也参加一定的对口劳动，这样既解决了知识学习的连贯性问题，又坚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而且培养出来的人年纪较青，这正是从根本上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四人帮”妄想从这里捞点稻草做文章，完全是痴心妄想！

打着反篡改旗号的疯狂篡改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四人帮”的喊叫不可谓不吓人。然而，究竟是谁篡改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呢？

教育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是关系到教育革命方向的首要问题。在《篡改》中，“四人帮”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然而，这是放烟幕：且看，在他们所控制的大学里，谁安排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学，就被诬蔑为“苏修的框框”，“学党史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他们要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作斗争上”，而且“能和走资派斗，就可以打九十九分”。这难道是培养学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吗？否，这是教唆、诱骗学生去削弱、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教育学生反修防修吗？否，这是打着反修的旗号，妄图把青年学生拴到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战车上，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卖命。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坚持不坚持这一条，是关系到教育革命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四人帮”接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叫得震天响，《篡改》也写道：“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说得多么好听！但是，我们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吧！毛主席指示要“以学为主”。他们却说什么：“大学没有专业”，（下转第四版）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上接第二版)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活动,没有纳入统一计划;纳入计划的,有些也没有严格按计划办事。要使国民经济走上轨道,就得强调计划性。重大的经济活动,必须纳入国家计划。订计划要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搞好综合平衡。经国家批准的计划,必须严格执行。要通过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弄清楚各条战线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要加强各级生产指挥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从上到下都要有责任制,根除无人负责的现象。要在巩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应当由地方办的事,要积极支持地方去办。中央各部门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把该管的事情主动管起来。

第四,大力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首先是加强农业,尽快把粮食搞上去,把经济作物搞上去,把多种经营搞上去。不把农业基础搞稳固,工业发展就快不了,人民生活就提不高。发展农业根本是靠学大寨,要发动亿万农民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重点还是抓改土、兴修水利、增施肥料和改良种子。国家要从各方面给以支持。特别是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毛主席提出的一九八〇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一定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搞法,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讲求实效。我们要采取各种措施,力争今后每年多增产一些粮食,以保证在满足人口增长需要的同时,使建设规模有所扩大,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粮食储备有所增加。

遵照华主席指示的精神,工业方面,要把动力、燃料、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放在突出地位,大力发展,更好地支援农业和轻工业。为此,首先要充分发挥这些部门现有企业的生

产能力,大力搞好挖潜、革新、改造。这是花钱少、见效快的好办法。同时,要集中力量打几个歼灭战,有计划地新建和扩建一批动力、燃料、原材料工业基地,新建和扩建一批交通运输的重点工程。在这些建设中,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同时继续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努力发展中小煤矿、中小电站,巩固、提高和发展中小钢铁厂。

第五,研究解决若干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问题。为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如价格政策、劳动政策、工资政策、能源政策、发展新技术的政策,等等,需要进行调查研究,逐步加以解决。

价格政策方面,要研究解决有些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偏高,有些农副产品和有些原材料、燃料价格偏低等问题。

劳动工资政策方面,要研究解决如何进一步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合理使用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如何更好地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分配上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问题。

技术政策方面,要研究解决如何鼓励发明创造,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的问题,以及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如何更经济更有效地从外国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和技术专利的问题,等等。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们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材方面,耽误了许多年,不少方面青黄不接。现在,中央大力抓科学研究和教育,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制定规划。我们要大力支持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它们尽快赶上去。

第六,有重点地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些生活问题。城市职工,主要是办好集体福

利事业,改善副食品供应,分期分批地解决宿舍问题,以及搞好城市公用事业的问题。有条件的工矿区,要积极组织职工家属从事集体的农副业生产。努力改进商业、服务行业的工作。农村社员,主要是解决增产增收的问题,日用品供应问题,以及盖房子所需要的建筑材料等问题。有些穷社穷队,国家要重点帮助。这些问题,要由国家、地方、企业和社会队结合起来,根据有关政策,订出具体规划,逐步加以实施。要积极支持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经济工作中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各位委员对我们的缺点提出批评,并对加快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

展望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我们充满着信心。我国有众多的人口、辽阔的幅员,有丰富的资源,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人民,有二十多年建设起来的物质基础,还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通过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的党更加坚强,我们人民的觉悟更加提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尽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一定能够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遗愿,在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

(上接第三版) “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铁锹就是专业”。他们砸毁实验室,荒废图书馆,给勤于教学、肯于钻研的师生扣上“智育第一”、“白专道路”的帽子。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以学为主呢?在他们控制的大学里,有的班级的专业学习时间全年只有八个星期,仅占全年学时的百分之二十。为了制造反对以学为主的“理论”根据,张春桥公然篡改马克思原著,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保护童工而提出不得超过的劳动时间,篡改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学生劳动时间的“设想”,胡说什么马克思主张十六到十七岁的学生每天劳动六小时。如果照此办理,我们的学生还能以学为主吗?提高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是毛主席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反对以学为主就是阉割了这样一项重要内容。毛主席指示要“兼学别样”。可是,在“四人帮”的统治下,一些学校的学工学农,竟被他们纳入“开门捣乱”、“开门夺权”的轨道。反党电影《反击》不就是用反动的艺术形式,毫不掩饰地宣扬迟群的“开门办学=开门夺权”的谬论吗?

“四人帮”和《篡改》的作者还把清华大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当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先进经验大肆吹嘘。本来,如果从理论联系实际改革教学,在一定条件下结合生产任务是可以的。但是,“四人帮”大搞绝对化,把它当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唯一形式,强行推广到整个教学的全过程,根本否认人的认识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规律,否认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否认知识的系统性。迟群一伙极力鼓吹学员一进校就“打硬仗”,“受锻炼”,宣扬典型任务上得越早、越大越好。有的专业,学员入学就交给和当时

高班毕业实践一样的任务,结果只能是教师出方案,学员跟着转,简直是对广大工农兵学员的坑害!“四人帮”所谓的“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就是不要基础理论,不要系统知识,搞的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教育由谁来领导,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的一个根本问题。“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四人帮”以“帮”篡党,以“帮”代党,拚命反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他们在学校中煽动无政府主义,鼓吹“和党委对着干”,“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挑拨工宣队和学校党委的关系,成立凌驾于党委之上的“上管改委员会”,制造三权鼎立的局面。他们到处挥舞“走资派”、“投降派”的大帽子,疯狂打击学校的革命领导干部。“四人帮”对学校中党的领导干部能打倒的就打倒,不能打倒的就打病、打跑,这还谈得上什么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

“四人帮”和《篡改》的作者还抓住“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这句话大批特批,甚至挥舞起“右派”的大帽子定人罪名。他们的矛头,表面上指向周荣鑫同志,实际上是指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在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的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提出外行的同志要热心于变成内行。这有什么不对呢?毛主席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为无产阶级办教育必须热心教育,热心科学。学校的党组织要有专人主管教

学。这样的同志应当是内行,至少应当是接近内行的外行。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教育工作尽快搞上去。“四人帮”破坏党对学校的领导,反对学校党的领导,这只能证明他们口谈教育革命的方向,干的是破坏教育革命的勾当。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四人帮”及其御用“北门学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炮制的反党乱校大毒草,贯穿着这样一条黑线:从教育上发难,诬陷周荣鑫同志,为打倒支持周荣鑫同志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造舆论,罪恶的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篡改》在全国造成的恶果是很严重的。它直接涉及的虽然只是教育上的几个问题,但起的破坏作用和恶劣影响极大。在它的煽动下,一大批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负责同志遭受迫害,教育战线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横遭打击,整个教育革命几乎被断送。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胜利地进行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不仅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毛主席亲手开创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使我们更加明确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必胜的。任何妄图篡改历史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原载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